



核心阅读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度调整，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交织冲突，世界发展将何去何从？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一世纪之问重新让人思考。

近代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在生命最后几天振聋发聩地提出：“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伴随了梁漱溟先生的一生。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度调整，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交织冲突，世界发展将何去何从？世纪之问重新让人思考。

(一)

战争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1618—1648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宗教战争，战时和战后签订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条约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许多学者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欧洲历史上近800万人丧生的宗教战争，明确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开创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先例，确立现代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建立了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雏形。在此后长达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仍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基辛格如此评价：“17世纪巧妙地缔造了威斯特伐利亚式和平的谈判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为一个全球适用的体系奠定基础。”

人类社会从野蛮战争到部落战争、再到地区战争，最后发展成世界战争，每一次战争都引发人们对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深刻思考以及对永

久和平的无限向往。尤其是20世纪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浩劫和惨痛的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遍及欧亚非三洲，33个国家15亿人卷入战争，参战军人死亡约1000万人，负伤2000余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遍及几大洲几大洋，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卷入战争，军民伤亡总数近1亿人，军费开支庞大，经济损失惨重。痛定思痛，避免悲剧重演，就成为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美好的愿景。几乎所有的国际规则都是世界大乱之后进行大治的结果，都是对国际秩序重新调整的规制。1945年生效的《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地表明，“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宪章第一章第一条就规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不仅如此，宪章第一次把维护和平与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是深刻的战略思考。70多年来，尽管世界并不太平，世界各地局部战争此伏彼起，但世界大战得以避免，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也是世界人民最大的福祉。

战火的教训，才使世界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传统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必将导致世界经济再次走进死胡同，只有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才是世界经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必由之路。而美国历来倡导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适的价值

观，随着“美国优先”战略的提出，美式霸权再次暴露。

纵观世界历史，霸权国家是指一个国家能够将它的一揽子规则强加给国家间体系，并由此以它认为的明智方式创建一种世界政治秩序。迄今为止，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史上存在过荷兰、英国、美国三个霸权国家。霸权国家必然会缓慢衰落，是因为它们不可能永远维持其对世界地缘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它们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最终会破坏它们的经济优势。同时，在追求维持其政治—军事权力时，最终也会破坏它们的政治—军事权力。世界经济版图对比的变化，加速了世界格局的变化，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近40%，世界呈现出多极化进程和东升西降的趋势。尤其是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发展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捍卫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二)

修昔底德陷阱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成为国际关系中需要实践规避的问题。所幸的是，在已过去的500年中，至少有4个成功的案例，其中崛起国和守成国成功地驾驭了各自国家的巨轮，从而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穿过险滩。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中美贸易摩擦无疑会对我国企业以及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增加经济风险，但是，影响总体可控。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变小。2018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08.6%，其中最终消费贡献率达76.2%，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内需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成为中国抵御外贸风险的有力武器。同时中国有近14亿人口、9亿劳动力、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技能的人才资源、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1亿多市场主体，具有经济的韧性及回旋余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的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从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下行带来更多的风险与压力。从长远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面对外部挑战，对内中国人民会空前团结，抛弃幻想、自力更生、矢志奋斗，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加速为自身的发展进行更多的战略准备。对外加快拓展更多的国际合作发展空间，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

(三)

习近平总书记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破解世界难题、建设美好世界的一剂良方。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此提出了建设路径，即“五要”：要相互尊

德国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启示

□ 刘俊杰

德国是世界上社会治理制度、法律制度、福利制度较为完备成熟的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是工业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德国守时守信的严谨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对规则和计划的严格遵守程度，是很多国家不多见的。德国社会能做到秩序与活力的平衡，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德国民众对政府、社会组织的信任，协同治理社会的合作精神，无不与德国民众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有关。

自治制度是德国民众有效参与的保障

地方自治制度是德国很成熟的制度之一，也是德国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协作的持续活动，并非仅仅依靠国家强制力去实现。一个经济充满活力、民众富有热情而有序参与决策和管理国家事务的社会，一定是人民分享美好生活的社会。这样一种现代社会状态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在我们与德国政府公务员、社会组织成员、大学教授、公司负责人和柏林的流浪者普遍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是，德国人对地方自治制度情有独钟。

德国是一个有着浓厚地方自治传统的国家，有16个联邦州，州享有较大自治权。地方政府以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促进地方和谐协调发展为主要治理目标。德国的地方自治十分重视集权与分权的平衡与结合，社会治理权高度分散，由社会组织和民众自己能解决的事务，政府绝不插手，而调控权高度集中。县（市）乡镇地方政府能办的事，州政府不干预。政府在财政分配和执行过程中贯彻平衡政策，下级政府既不把自己的职能推向上级政府，上级政府也不会超越法律，随意将自身职责和任务摊派给下级政府。

德国成熟的地方自治制度，调动了德国民众参与地方决策和事务方面的热情和主动性，能激发为地方公共利益贡献智慧和力量。地方政府与民众联系最为密切，一个有能力且自信的自治政府，是以民众的利益为核心的。处理好自治与民众的良好互动关系，不仅能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而且能够

更好地培养民众的品德，使其自身权利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价值。

德国自治制度中最为核心的权力是地方预算的权力。德国的法律非常重视民众对地方财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政府各个部门的财政预算和支出必须向社会公布，政府各部门的每月财政支出报表都要公开，接受民众对财政的监督。因为对地方自治的需求，只有民众的有效参与，才能避免权力导致的腐败。二战后，德国突出民主和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把法治作为现代社会秩序治理的基石，强调依法治社会事务，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从教育、养老、住房保障、道路交通、社区服务等都有明确的法律保证民众的社会参与。

社会组织是民众有效参与的途径

由于德国自治制度的传统和宗教文化影响的因素，德国的社会组织数量、形式和功能都很发达。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一元，为德国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途径。据我们在德国的考察，每一位德国民众都会参加一到两个以上的社会组织。德国学者把社会组织界定为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正式组织体系的自我管理组织。

德国的社会组织如此发达的原因，除了德国经济发达作为物质基础外，很重要的是由德国的发展模式决定的。德国的模式与美国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德国模式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理念，主张将“市场自由与社会进步相结合”，主要特征是：崇尚市场竞争，反对垄断，提倡国家适当干预，维护社会秩序与法治的结合，注重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统一，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倡导劳资“共同参与”决策的企业治理制度，倡导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平等对话的社会治理体系，以保障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的平衡，其基础是高质量的教育制度和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从而保证了德国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德国的社会组织作为德国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柏林市有大大小小数千个社会组织，如居民自治组织、律师协

会、厨师协会、家政服务协会、志愿者协会等。我们到一家慈善基金会座谈，这家协会是一位企业老板成立的，是一家非营利组织。他介绍，成立这个社会组织的目的是志愿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企业赚钱不是唯一目的。通过建立志愿者社会组织，通过网站定期组织活动，在帮助他人做公益活动过程中，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获得人活着的价值、乐趣和满足。

社会诚信是民众有效参与的基础

民众参与社会活动，不仅有制度提供保障，协会提供平台，还要有人和人交往中的信用做基础。德国不仅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信用评价较高的国家。我们知道，诚信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条件，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石。民众为什么热诚地自愿地有效地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治理，并从中获得人自身的价值呢？更深层的原因还是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德国的文化体系中，每个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都信奉并严格遵守社会契约、规则、法律、承诺和约定，不仅守时守信，而且鄙视出尔反尔、朝令夕改、肆意妄为的行为。

与所有去过德国的人一样，我们在德国期间，无论是进行学术交流，还是德方安排的所有活动，随行人员和参加的人员，都做到了准确无误、严谨合理，让人感到舒服愉悦，每个细节做得恰到好处，既有质量又简约，人人平等、人人真诚、人人自

信。比如，德国高速公路的规则设计，不限速但事故很少，其原因不仅是公路质量和汽车质量好，更是驾驶员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对规则的承诺，一丝不苟地执行。德国公路和德国汽车的质量正如德国的工匠精神一样。当然，这些与德国的教育制度有关。我们在一周的酒店住宿中，没有繁杂的程序，办理所有手续很简便，对人的信任，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感到规则制定出发点符合人性，符合人对幸福需要的满足。德国这样的诚信文化传统和氛围，让每一位德国民众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治理有了安全感和信任感。

那么，德国的社会诚信体系是如何构建的呢？德国对构建社会诚信有着完备的法律体系，德国的《民法典》关于诚信有明确规定，通过一系列相关制度，还有法制教育，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告诫人们要诚信守法。在德国的宗教和日耳曼民族文化传统中，具有浓厚的规则和契约意识，如果一个人违背社会规则和信用，一般会招致人们的谴责和异样的眼光，对其形成潜在的道德和规范压力，促使失信的人及时修正自己的过失行为。

社会公正是民众有效参与的核心

公正的社会，不仅是制度设计得公正，而且是社会价值观充满正义。正义的社会不可能是无差别、平均主义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不仅要承认市场经济竞争带来的社会成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别，更要让

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要坚持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擘画出了最美好的蓝图。中国方案的提出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可和接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和决议。这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巨大贡献。

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势不可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会成为世界政治发展追求的共同愿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崇尚和谐，以和为贵。中华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这些都将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政府提供廉洁公正的服务。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救济，对弱势群体的援助制度，能修正市场失灵缺陷。社会公正原则不仅是德国的社会治理的原则，也是德国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与核心。

德国在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有两个基本原则：程序公正和地方自治性。所谓程序公正，就是制度制定、决策、执行过程中程序要公开公正公平。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制度、法律和规则对待所有社会民众要保持一致性，一视同仁、无偏见，尊重不同意见，建立完整准确的信息和仔细的数据收集并公开。对政策可修正性，民众可投诉和提出异议，尊重各方利益，尊重现行道德观和伦理价值。

正是德国社会公正原则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民众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和政治决策的动力和目标。德国民众参与志愿服务的人数常常占到全国人口的40%，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民众参加志愿服务的动机是社会责任，融入社会、帮助弱势社会阶层，参与领域最多的是体育、幼儿园、老人院、教堂等，政治领域参与的志愿者则很少，而且教育和收入程度越高的人参与度也越高。

德国社会注重社会公正原则，保持了德国社会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在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德国民众优先选择稳定性。德国一个重大决策的落地需要多党协商达成一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要达成一致很不容易，因为每个州有很大的自治权，达成一致需要时间磨合，但是一旦达成一致，德国人的执行力是很强的，发展也是很快的。

